

 海外汉学丛书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y Naito Konan

中国史学史

〔日〕内藤湖南 著

马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K092
201/83
海外汉学丛书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by Naito Konan

中国史学史

〔日〕内藤湖南 著

马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 / (日) 内藤湖南著; 马彪译.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11

(海外汉学丛书)

ISBN 978-7-5325-8640-0

I. ①中… II. ①内… ②马… III. ①史学史—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1811 号

海外汉学丛书

中国史学史

[日] 内藤湖南 著

马 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30 插页 2 字数 417,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978-7-5325-8640-0

K · 2394 定价: 6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关注海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早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出版了《海外红学论集》、《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等著作,并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80 年代后期,在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和海外著名汉学家的支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海外汉学丛书》的出版计划,以集中展示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自 1989 年推出首批 4 种著作后,十年间这套丛书共推出 20 余种海外汉学名著,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海外汉学丛书》包括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各国著名汉学家的研究著述,涉及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富于创见的研究精神,是其宗旨,也是这套丛书入选的标准。因此,丛书入选著作中既有不少已有定评的堪称经典之作,又有一些当时新出的汉学研究力作。前者如日本学者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和自然观》、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后者以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为代表,这些著作虽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对研究对象作了深入细微的考察和分析,体现出材料翔实和观点新颖的特点,为海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所借鉴。同时,译者也多为专业研究者,对原著多有心得之论,因此译本受到了海内外汉学界和读者的欢迎。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外学者的交流、对话日趋频繁而密切,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成果的借鉴也日益及时而深入,海外汉学既是中国高校的独立研究专业,又成为中国学人养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取资对象。新生代的海外汉学家也从专为本国读者写作,自觉地扩展到以华语阅读界为更广大的受众,其著作与中文学界相关著作开始出现话题互生共进的关系,预示了更广阔的学术谱系建立的可能。本世纪以来,虽然由于出版计划调整,《海外汉学丛书》一直未有新品推出,但上海古籍出版社仍然持续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海外汉学专题译丛,或从海外知名出版社直接引进汉学丛书如《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出版经验及资源。鉴于《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学术界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听取学术界的意见,决定重新启动这套丛书,在推出新译的海外汉学名著的同时,也将部分已出版的重要海外汉学著作纳入这套丛书,集中品牌,以飨读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3月

《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是近代日本历史学界的巨匠,他的业绩在其歿后虽已经过了七十多年,于今日仍然璀璨辉煌,在世界学术界有着深刻的影响。湖南不仅限于中国史,即便在日本文化史方面亦留下了巨大的成果。他不仅精通传世的历史文献,还率先向世人介绍了甲骨文、敦煌文献、满洲史料等新发现的史料,对甲骨学、敦煌学、满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的卓越学风特点之一,就是擅长把握总体的历史。例如,今天所谓“唐宋变革”的观点就是他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首唱的。这也是他所创立的中国史时代分期说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唐宋变革”论即便在今日,仍然是世界学界所讨论的对象。

《中国史学史》在他的庞大著作群之中,可谓名著中的名著。至于此书的成书始末,正如其嗣子内藤乾吉以及高足神田喜一郎在原著序、跋中所叙述的那样,是根据他在京都大学讲课的内容结集成书的。史学,是人类对自身经历的过去予以自觉认识的学问,湖南是将中国上古至清代这样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认识轨迹,作为一部庞大的史书著作史予以描述的。

当然,在上古时代的最初是不可能存在可称之为史学的学问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应该称为史学前史的时代,湖南是将其作为记录的起源进行寻求的。他在本书的开头曾说:“关于中国的历史即记录的起源,是可以将记录的起源与记录者即史官的起源同时予以考虑的。”即他对史学史的初源的认识是从考察记录的起源开始的。在此,他认为历史就是记录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人类的生活在记录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但是,那毕竟是从人类自身被认识以后才成为有意义的事物。人类对过

去的认识,是通过口诵和记录流传于社会的;运用文字手段的记录,则可以自觉地、客观地表达人类对过去的认识。我认为内藤湖南将历史作为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予以把握的情况,说明他认为历史开始于人类对过去的自觉认识。

随着记录的普及,出现了各种著作,其中关注过去—现在—未来之时间运行的叙述则是史书。进而,带着究竟应该怎样做出叙述的问题意识,对历史从内容、形式两方面进行考察的学问则是史学。这不仅限于撰述新的史书,而且能够产生对既成史书的评论,而这些评论又可以开辟出新的著作领域。

绵延久远之中国文明的持续性,必然地提出了究竟应该如何叙述过去时代的课题,而作为对此进行思维的结果,又产生了举世无双的、庞大的著作群。它不仅记载了过去的无数事象,及至现在之博大的世界知识,而且还表明了后人对于这些记载的态度和见识。这本《中国史学史》就是将这些史学著作、见解作为一部学术发展史所作的总括性著述。

本书不仅是著者赅博知识的产物,又加之原本有着一种讲述的形式,所以绝非容易读懂之作。著者歿后,内藤乾吉等虽对原著附以章、节目录,但也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些便利,至于探索本书的旨趣则仍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一边探索著者本意一边阅读此书的话,就能使人体会到著者对中国史学发展主线的清晰描述,以及对其背后存在之时代思潮史所作的深层阐述。我对本书的理解虽然肤浅,仍愿就此著作的思路发表一些感想,代为序。

首先,第一、二、三章是一个系列的内容,即对史书形成之前的记录与记录者的实体,所作的尽可能实证性的叙述。这一时代虽说尚未出现清晰而有意识地以过去、现在为时间轴的记录,但是那毕竟是不久之后所形成之史书的起源。由于内藤湖南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有着强烈的共鸣,所以在第四章《史书的渊源》中,他阐述了史官这种政府记录官所司掌的记录,从六经至诸子、诗赋、兵、术数、方技,再至《汉书·艺文志》所载六略诸书的发展过程。

以上诸书之总合性集大成者又数《史记》(第五章)。《史记》的记录

不仅明确地贯穿了从传说时代至现代的时间轴,而且能够以与大一统时代相称的空间视野为背景,对人类命运予以了丰富多彩的描述。这样,出现了真正具有史书价值的著作,而在这一过程中,类书型书籍的撰述也是不容忽视的。即在当时总合记录的形势下已经有了类书形式的诞生,而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予以统一记述的毕竟还是《史记》。

有关从类书发展到统一的、独创的史书的现象,在第八、九章中也有所叙述,这两章其实是在讲唐宋变革时期史学的变化。他指出这个时期政治上是贵族制社会的多元权力向君主独裁制的一元集权政治的转型期,此间发生了从类书体例的《册府元龟》到一家著述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变化,并认为这种变化具有帝王学的性质。内藤湖南在《中国上古史》(夏应元监译《中国史通论》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中,曾指出战国秦汉时期多少已经有了君主独裁政治的倾向,这种政治上的类似与史学史上的类似或许有着某种对应,《史记》与《资治通鉴》这两大高峰成为了各自时代的代表,颇为令人深思。

总之,像《史记》那样内容、体例均可称之为真正史书的著作出现了,《汉书》继续了这种史书撰述的潮流(第六章)。尽管两史之间有着通史与断代史的区别,但毕竟由此进入了真正的中国史学史阶段。特别是《史记》、《汉书》构筑了正史编纂传统以后,以此为中心,史书的撰述开始带有了惯例的性质。《史》、《汉》两书创始的《纪》、《传》、《表》、《志》等编纂方式,又分别产生了各个独立领域的史书,如在《隋书·经籍志》所见的那样,史书中出现了更多的分野。在图书分类上,独立形成了“史部”的领域,经过六朝时代各种图书分类法的设计,最后出现了《隋志》那种“四部分类法”的结果。第七章“《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中就是这样叙述史部独立的情况的。同时著者也指出:在另一方面,史书的发展也出现了丧失《史》、《汉》那种历史家精神之形式主义的堕落倾向。而且其中具体的现象之一就是,在唐代出现的正史编纂从一家之著述变成成为分纂的倾向。本章的时代背景是六朝、隋唐,即内藤湖南分期法中的中世贵族政治的时代,当时出现了作为家学修史的国家事业化的情况,完全是与门阀贵族制向官僚贵族制的推移的过程相互对应的。

在这一章记述中值得注目的是,著者加进了史注与史评这样新的分野。根据湖南的观点,史注是由于受到经书注疏学影响的产物;史评则是有关史书叙述法的议论,是后世对既成史书的反省。从六朝时代开始的史评,至唐代刘知幾的《史通》终于形成了史评的专著。史注、史评都是从当时史学中那种单纯写史的著作,进而发展为对既成史书加以解释、评论的产物,这显示出史学史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换言之,如果说包括目录学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产生于六朝、隋唐时期的话,亦不为言过其实。至少,我认为内藤湖南的本意看来正在于此。

湖南认为:史注是史书的训诂学,宋代以后虽然基本衰落,但是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那种对旧史的修补、考订,其实就是那一系统的继续。这一分野作为考据学的一环在清代达到了极盛,对此湖南在本书的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学”有着详细叙述。关于清朝的史评虽然也特别在这章中设置了一节,但却只有一些标题目录而没有具体内容。但是,如果说旧史的修补、考订中包含了史评的意义的话,则是不过分的。湖南还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在各章之中极其详细地介绍了清朝学者对清朝以前史书的意见。这一点是其他中国史学史著作中所见不到的独到之处,也是特别能够向读者传达中国历史学厚重传统的笔法。

就这样,中国历史学通过唐宋变革发生了飞跃的发展。湖南认为唐宋变革的先兆已见于六朝末唐初,其在史学史上也有所表现。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中,主要阐明了古文复兴与史学的关系。湖南很重视史书文体与其内容之间的密切关系。文章从古文到骈体文的变化,曾经影响到正史叙述的文体;再度出现复归古文气运时,又带来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到《新唐书》、《新五代史》,再到《资治通鉴》的史学发展(第九章“宋代史学的进展”)。这一变化的又一条路线就是前述那种从《册府元龟》到《资治通鉴》之帝王学的变化。

宋代史学又开拓了新的分野,即金石学与目录学的发展。复兴古代的气运促进了对金石资料的重视,出现了对古董器物汇集及解说的著作,这些著作不妨视为中国考古学的起源。目录学中出现了为书籍作题解的新倾向,这也可以说是后来书志学研究的萌芽。湖南指出的这两个学问

分野,使我们感到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历史学逐渐地带有了近代性的特征。

宋代又是周边游牧民族勃兴,甚至占据了我国部分地区,建立王朝的时代。这种形势最终导致了元朝对全国的统治。出于这种时代背景,兴起了正统论这种史学争论,并且一直持续到了后代。从近代历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争论虽说并无多大意义,但是湖南将其作为了解中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予以了详细的介绍。进而值得注意的是,湖南是从宋代以前的正统论开始阐述的,由此可见他的视线经常是由古到今,又从今至古双向移动的。他认为与断代史相比,通史有着更大的价值,看来这与他的观察能力也是不无关系的。

正统论毋宁说盛行于元代,第十章“元代的史学”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他虽然将元代作为史学成果的贫乏时代,但是对非汉族王朝之元朝独特的史料情况,仍给予了认真的叙述。

在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成熟的明、清时代,史学也有着格外的发展。专门论述明、清史学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两章,占据了全书一半的篇幅。开始于宋代的史学新潮流,不妨说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潮。简而言之,在经过长期积累的传统史学继续发展的同时,通向近代历史学特质之一的合理主义、实证主义的道路亦呈现于当时史学的内部。但是,这一道路又决非一条直线。大而言之,宋至明之间,明至清之间不得不经历了两次思潮的转换。例如,就掌故书而言,在宋代的掌故记载了有关朝廷的故事、仪礼的见闻;至明代时又采入了野史。这虽然可能有着扩大掌故学材料的效果,却不免事实正确性欠缺之憾。至明末又发生了一变,出现了以正式记录为本的学风,并一直发展至清朝。

历史叙述中是强调主观意志,还是重视事实客观性,这可以说是历史学所无法避免的课题。新旧《唐书》、《五代史》以来的这一课题,从宋至清这一时期曾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交错展开着。大略而言,就是宋学与汉学两大潮流。湖南对在汉学优势潮流下展开的清朝史学的庞大成果予以了精细的探讨。这里虽说不可能对其逐一地进行介绍,但是就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本文已在清以前的史学中有所言及。而且,关于清朝史学的整

体内容,建议读者结合内藤湖南《清朝史通论》第五章“史学及文学”(前揭夏应元监译《中国史通论》下卷)一并阅读。

一言以蔽之,就清朝史学的领域来说,时间纵贯古今,空间涉及塞内塞外。另外,对那些史学家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史学成果,进一步加以细致检讨、批判的,还有以章学诚所代表的那样,对历史到底是什么这种根本问题所进行的思索。就这样,中国历史学以其实证性与追求原理的精神,明显地出现具有了近代学术的趋势,湖南的叙述使我们对此感到确信不疑。

以上,仅仅是对本书博大精深之叙述所作的简要勾勒而已,如有误解和偏见的话,请不吝指正。然而,对于本书这种惊人的工作,湖南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不用说这与湖南对于中国学术出众的知识,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非凡见识是分不开的,进而应该加上一点,即还有他本人与中国文化之间关系的特殊方式。本书中他提到了历代中国学者的见解,并屡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时也批判以往的见解,这应该说正意味着他是把自己也置身于中国史学史之中的。他认为东洋史(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国上古史》绪言,参见前揭夏应元监译本)。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在他那里是没有今日这种根据中国、日本等等近代主权国家进行划分的意识的。

一般说来,作为近代以前朝鲜、日本的学者来说,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论是儒学还是艺术,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的。湖南也是将自己置身于东亚这种文化世界之中,进而对中国学的近代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本书的翻译者马彪教授,赴日以来一贯致力于内藤湖南史学的研究,这回又在他不同寻常的努力之下,使本书首次被翻译为了中文,为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悦。我相信本译著的刊行,一定能够推动中日两国学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谷川道雄

2007年9月25日

例 言

本书是根据著者在京都大学所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整理而成的。著者曾有意将自己在大学讲授的“中国史学史”和前些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亲自予以整理出版。对此尽管著者在生前有过出版的承诺，怎奈最终没能实现这一愿望。著者是带着这种遗憾去世的。从那以后已过了十五年，我那种尽早出版此书的愿望虽说从未泯灭过，但毕竟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很多，以至拖延至今。

著者在大学曾经前后三次讲授“中国史学史”。从京都大学现在尚存的授课题目来看，第一次讲授是在大正三年至四年（1914—1915），历时两年；不过我手头没有任何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那次授课内容的材料。第二次讲授是在大正八年、九年和十年（1919—1921），历时三年；这次是从古代一直通讲到现代的。第三次讲授是在大正十四学年度（1925）；这次讲授的题目是“清朝的史学”。本书，就是以第二次、第三次的授课内容为底本整理而成的。

由于著者讲课从无准备讲稿的习惯，所以当著者有意将自己的讲义出书的时候，他采取了订正听讲者笔记的方法。因此，著者把上述第二次授课时两三人听课笔记收集起来，于大正十二年（1923）利用大病初愈后在有马温泉疗养的两三个月，进行了修订。怎奈当时是在温泉旅馆疗养，案头一本参考书也没有，所以订正也只是大体上将两三种学生笔记进行对照，将这边出缺的部分用那边的笔记补上而已。当时他修订到了清朝的《考订旧史的史学》的部分。那以后，在大正十四年著者讲授《清朝的史学》时，他先是把从《史记》到清初的内容，以绪论的形式加以简略叙述，随后继续讲述在有马疗养时没有修订完的《考订旧史的史学》以后的

部分。不过,当时他又增补了相当多的内容,所增补内容的要项都记在了笔记上。著者为讲述中国史学史所做的准备,大致如以上所述。从那以后看不出作者对此书有过修改的痕迹。著者于大正十五年大学退休,隐居南山城的瓶原村(现在的京都府加茂町)以后,便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著作。虽然出版了《研几小录》、《读史丛录》、《(增订)日本文化史研究》等书,但是尚未来得及着手《中国史学史》、《中国上古史》的整理,就于昭和九年(1934)去世了。因此,本书一直是作为未定稿保留了下来,最终也没能补充进著者晚年的新见解。

著者去世后,本书很快就被列入了出版计划。但是,首先要做的是将著者本人未整理完的手稿继续做完。而这是一件相当繁琐的工作,幸好我们有一位最为合适的人选,即不仅是亲自聆听过本课程,而且谙熟著者学问的神田喜一郎教授。他承担了这一工作。由于当时神田教授正在台北大学任教,所以整理工作也是在台北进行的。其间又由于战争的爆发,本来就交通不便的台北几乎与日本断绝了联系,那段时间内本书的完成几近渺茫。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神田教授回到了京都,这才使本书的完成获得了转机。然而,回到京都后的教授却日渐繁忙。所以考虑到既然已经恢复与教授的正常联系,那么整理书稿的工作也可以由我来分担一部分了,于是稍稍改变了一下工作方针:采取了先由我做校对,再由教授进行校阅的方式。我当时正在京都府立图书馆任馆长,由于本来就有辞职的意向,加之公务之余又确实难于进行书稿的校订工作,更何况当时希望能够利用著者遗留在瓶原村的藏书,所以就借此机会辞去图书馆的工作,住到瓶原去了。那段时间里我得以专心致力于本书的校订工作。因为著者讲述中国史学史时所使用的参考书籍十有八九都在瓶原,所以当时这样做可说是最方便的办法了。在瓶原的校订工作历经数月终告完成。由于尚需由神田教授校阅,所以我经常与教授一起阅读原稿,并由我就有疑问的地方向教授提出问题,听取教授的意见,采取了随时有问题随时解决的方法。根据教授明快的判断,一般的问题都能马上予以解决。然而,即便是用这种最为节省时间的方法,在最终完成校订的一年里,我们还是花了二十天的时间才得

以截稿。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整理工作。大体上说这次我们所做的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除了著者曾经参照过的课堂笔记以外,我们又另外参照了两三部笔记,以求尽可能地再现当时授课的原形。这样的方法,往往比授课数年后著者凭借记忆进行的订正更加准确。不过,由于可参考的笔记毕竟有限,个别地方只有一种笔记可供参考。第二,尽可能地查对了我们认为著者授课时参考过的材料,对于那些明显属于作者不慎或记忆有误的地方进行了订正。第三,将听课学生各式各样笔记的文字统一为口语文体。当然,这些都只不过是些枝节问题,可谓无关宏旨。只是担心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反而犯下意想不到的错误。另外,在此还有几点是有必要说明的:

如前所述,本书虽说是以第二次、第三次的授课内容为底本修订而成的,但其中所谓根据第三次授课只是指《考订旧史的史学》以后的部分。由于第三次授课是在第二次授课的基础上补充以这一部分而进行的,所以对这一部分的修订参照了著者本人订补的笔记和该年度的学生的笔记。只是,我手上这一年度的课堂笔记虽有三种,怎奈其中两种都缺少《西北地理之学》以后的部分,有一本虽然一直记到了最后,但又颇为简略。因此,《西北地理之学》以后的部分就多少显得有些遗憾。而且,特别是《金石之学》的后半部分,大都是那次增补的内容,可是这一增补的部分在著者修订的笔记中又仅仅列出了各条项目,而听课笔记又很简略,所以无法完整地再现当时的授课内容,也只好留作缺憾了。《官书》一节也是这一年度增补的部分,所以也存在着同样的遗憾。另外,在《金石之学》这一增补项目中,虽记曰:“波理欧特(Pelliot)的发现当另放到校勘学一节去讲。”但学生笔记中并没有“校勘之学”一项,所以在第三次授课时究章是否讲了这一节也不清楚。也许是著者讲述了敦煌遗书,而又未能补充上波理欧特的发现,亦未可知。《史评》一节也是由于学生笔记的不全,以致难以再现授课的原貌。上述几部分如果将来能够找到更为完整的学生笔记的话,希望有机会再一次

予以补订。另外,关于本书的《清朝的史学》部分,先有了神田教授在台北时对著者所订正学生笔记为底本的校订,这次又在此基础上根据第三次授课的学生笔记作了补充。

著者在授课时是不标明章节的。但是由于他写了授课的纲目,所以有些课程的纲目被保存了下来。可惜,中国史学史课的纲目却一个也没能保留下来。本书的标题都是我们后加上去的。然而,在授课内容上,按照适量的内容在形式上整齐划一毕竟是困难的,更何况那样做也未必就妥当。虽然我们根据内容加上了标题,但是有些内容原本就无法命名的情况恐怕也是有的。再有,本书中对内容的出处予以了少许夹注,那不过是我们在这次校订时作为备忘写上的,由于并没有经过逐一地仔细推敲,所以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另外,在书后本来打算附上索引,以求弥补标题的不准确。但是由于出版界的严重困难,为了减少篇幅也只好割爱,以待来日了。^①

作为附录收入了三篇文章:《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昭和八年〈1933〉6月17日在支那学会大会上的演讲,载于《史林》第19卷、第1号),因为这是对《中国史学史》的补遗,本来是应该收入正文的,但由于是演讲体例,故而采取了附录的形式;《章学诚的史学》(昭和三年〈1928〉10月6日在大阪怀德堂的演讲,载于《怀德》第8号)是出于本书遗失《史评》一节,作为补充而附上的;《中国史学史概要》即前述大正十四年度(1925)讲授《清朝的史学》时开头的绪论部分,标题是我们加上的,由于与本书内容相互对应,故而附载于后。

为了本书的出版,在著者生前或去世之后提供了全部或一部分课堂笔记的有:梅原末治、鸳渊一、神田喜一郎、小牧实繁、杉本置治郎、内藤隼辅、宫崎市定各位,以及两三位不知尊名的先生。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特别恳请佚名的几位先生能够告知尊姓大名。

对于为本书投注以极大精力的神田教授的感激之情,则更是难以言

① 这里提到的《索引》在1967年出版的《内藤湖南全集》第11卷(即《中国史学史》卷)中已经补上,非常便于读者查阅。事实上,据译者考察:在日本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史词典的中国史学史的内容(如京都大学《东洋史辞典》)应该就是利用这一《索引》的产物。

表。没有教授的帮助,本书是无法问世的,在此谨志铭感!

昭和二十四年(1949)4月

内藤乾吉^①识

① 内藤乾吉(1899—1978):内藤湖南长子,曾任大阪市立大学教授,编修十四卷本《内藤湖南全集》(筑摩书房)。

目 录

《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谷川道雄 1
例言	内藤乾吉 1
第一章 史的起源	1
第二章 周代史官的发达	6
第三章 记录的起源	20
第四章 史书的渊源	30
一、史书的材料	30
二、《六艺》的形成	33
《易》	34
《书》	34
《诗》	38
《礼》	43
《春秋》	47
《论语》	52
三、“诸子”的形成	53
四、《六艺》外传	58
五、《楚辞》及诸国之代表著述	63
六、术数、方技之书	65
七、《汉书·艺文志》未载之书	67
八、先秦著作的发达程度	70
九、史官的地位	73